



王明问题研究

施巨流

著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王明问题研究

施巨流

著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王明问题研究

著者 施巨流

编审 贾子轩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国际书号：ISBN962—450—072—X/D · 49752



王明问题研究

著者：施巨流
编审：贾子轩

出版发行：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 123 号三楼
电话：26706633
传真：26701382

印刷者：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印数：1—400
开本：850mm × 1168mm 1/32
印张：13 印张
字数：340 千字
定价：港币 33 元 人民币 32 元
2006 年 6 月 28 日

前 言

王明的问题应当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对一些党的重要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毛泽东、刘少奇、项英等都进行了研究。对他们在党的历史上的作用，作了全面评价，有的清除了不实之词，有的清除了一些个人崇拜，逐步做出了公正的评价，这些都是必要的。唯独对王明没有进行公正的讨论和研究。有的专著或文章中也提到了王明一些对的方面，但对王明的错误缺乏客观的分析研究，该纠正的没有纠正。总的来说，仍然还在老调重谈，人云亦云，明知不对，假话照说的阶段。王明在我党的几十年的民主革命斗争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应当把王明问题的研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对王明问题做一公正的评价。因为，王明的问题不清楚，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段历史也就不清楚。王明的问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他参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十多年，他的活动，不是他个人的活动，而是党的活动的组成部分。而且，在一段时间内，是党的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他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首席代表。以他为首的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十二月会议上又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和新华日报初期的主要负责人等。对王明搞不清楚，那么对上述一段党的历史也就搞不清楚，对这一段历史也就无法做出公正的评价和正确的结论。尽管毛泽东讲了，教材上写了，权威的专著也出了，文章不厌其烦的批了几十年，表面上看起来很清楚了，其实很不清楚。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原有的看法认识，也不一定完全正确；原来

认为“完全正确”的，或“完全不正确”的，都不一定恰当，有认真讨论的必要。

为了吸取教训，对王明的错误应当批判。只有批判错误，才能纠正错误，才能吸取教训，党的事业才能发展，问题是长期以来：

把共产国际、苏共中央、斯大林的错误加在王明身上。中国共产党在“二战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的根子、责任都是在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以及斯大林的身上。当时为了同共产国际、苏共中央、斯大林搞好关系，严于律己，避而不谈他们的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事隔六十多年的今天，在研究王明的问题时，应当把责任分清楚。这样才符合实际，才使人服气，也才能正确的吸取教训。

中共中央和王明本人的责任也要分清楚。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是中央派出去的代表机构。他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之下进行工作的。他的任务是，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与共产国际、苏共中央进行联络，汇报情况，传达指示等等，在左倾错误中他有责任，但不负主要责任，不能把共产国际、苏共中央的错误路线的制定者与中共中央在国内执行中的责任加在王明的身上，王明和博古应当有区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不止王明一个，他们也有同样的情况，然而在对待上就与王明不一样。

王明的正确的部分应该得到正确的评价和肯定。对王明没有象对待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那样，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他们的历史功绩在哪里，他们的错误并不小，但帮他们说话的人并不少。当然，王明不能与陈独秀、瞿秋白相提并论。但在评价的方法上，应当是相同的。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功绩就是功绩，不能人为的扩大缩小或贬低。从当时的客观情况来看，王明是赞成拥护支持开建立发展苏区根据地的，是拥护土地革命的，是主张建立扩大红军的，红军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他是明确的，他是赞颂红军功绩的。从接触的资料上看，他

没有参与五次“反围剿”军事方面的活动，他在两次会上所谈的“反围剿”军事方面的看法，基本上也是对的。抗战开始后，他是主张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和游击性的运动战的，很早以前他就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为其实现竭力奋斗……等等。由此可见，王明在历史上对革命是有功绩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按照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分析、研究王明的问题。只有严肃的认真的开展讨论，找出问题的原因，才能正确的吸取教训，才能有利于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向前发展。

在研究王明“左”倾错误的同时，很自然的要联系到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后所犯的“左”倾错误，这种联系是为了说明问题的需要。

此稿只是为参与学术讨论提供资料，并非公开出版物，但其中有一半文章公开发表过。

作 者

1996年3月18日

(此文发表于《社科新论文稿》1996年第5期)

目 录

前言——王明的问题应当研究	(1)
《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不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 纲领	(1)
共产国际策划操纵下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5)
王明在“左”倾错误中的责任质疑	(10)
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的由来	(17)
我党历史上三次“左”倾路线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 命界限的原因探讨	(24)
第五次反“围剿”军事上失败负主要责任的究竟是谁？	(32)
毛泽东民主革命转变论研究	(37)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问题	(49)
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研究	(57)
回到抗战初期	(57)
王明与华中游击战争	(85)
对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几个问题初探	(101)
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结论不知从何而来	(126)
抗战初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统一问题	(133)
评王明的“两个一切”	(150)
共产国际的“两个一切”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	(165)
王明没有反对毛泽东的八路军的战略方针	(168)
毛泽东论抗日战争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规律 ...	(176)
反蒋 认蒋 拥蒋 赞蒋	(189)
抗战初期民众运动的“统一”“合法”说与王明右倾 投降主义	(206)
中共中央国共关系的论述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226)
抗战初期的国共关系	(234)
1938 年华中游击战争的特点	(242)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党的工作重点初探	(247)
《十二月宣言》的意义	(252)
探索几本中共党史对抗战初期王明问题的表述	(256)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毛泽东与王明	(277)
《中国共产党简史》中有关王明博古的评价议	(286)
再谈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结论不知从何而来 ...	(295)
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王明右倾错误的看法	(312)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经过	(330)
《中共 50 年》读后	(338)
华中游击战争的开展“丧失良机”谈	(349)
“四·一二”政变后民族资产阶级叛变了吗?	(358)
试析“四·一二”民族资产阶级叛变的根据	(366)
王明问题研究者施巨流访谈	(370)
后记	(374)
后记续	(395)

《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不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纲领

王明的《两条路线》小册子，很出名，众所周知，普遍的认为是王明的发迹作。王明在第三版序言中说，这本小册子于1931年2月在上海出第一版，当时名称是《两条路线》。1932年3月在莫斯科再版，当时因为作者加写了再版书后，所以改为现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几年中，我党又犯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更严重的损失。六届七中全会在研究探讨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时，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王明这本小册子作出了评价。《决议》说，在当时发表的王明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形势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新的“左”倾路线。《毛选》第三卷第964页中又说，六届四中全会实际上是批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陈绍禹同志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而这本小册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毛选》第3卷第966页）（完全错误的着重号是笔者加

的)《决议》认为《两条路线》一书,是王明的“左”机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其主要内容和问题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概括为: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成份”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上,他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的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污蔑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特别强调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上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此后,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包括前几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在内的所有党史著作,在谈到王明当时及其小册子《两条路线》“左”倾错误时,均以此为蓝本,内容完全相同。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其他中共党史的著作中,对王明《两条路线》中“左”倾错误的批判是必要的,(当时不可能直接的批评共产国际或联共,共产国际当时虽然已不存在了,但当时也不好说他)。但不能认为此书是完全错误的,一点正确的东西都没有。认为内容只有一个,即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政治纲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是不符合《两条路线》的小册子的实际的:

一、《两条路线》即《为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所反映的“左”的东西,都是来自共产国际。王明在《两条路线》一书中,在谈到每个问题时,首先都引证《国际决议》、《国际指示》、《联共说》、《斯大林说》等,王明在这个小册子第一版开头《几点必要的声明》中就坦白的说,这本小册子是根据“当时发表的国际几种决议材料写成的”,王明非常紧

跟共产国际联共斯大林，对他们深信无疑，达到狂热和迷信的程度。但这本小册子中的主导思想、基本理论，甚至大量的语言都是共产国际和联共的。既然主导思想、基本理论是共产国际和联共的，那么怎么说成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呢？如果问究竟是谁的政治纲领？那么可以说是共产国际联共中央斯大林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政治纲领。在这以前，我党中央的文件决议及党中央很多领导人都照抄照转过这个政治纲领，王明对这些问题，不过是老调重弹。或者说象某些歌星一样，他唱的是别人偏写的歌曲，不能把这个政治纲领说成是他的——王明的政治纲领，否则就是张冠李戴了。当然也可以象王明所说的那样是照抄照转，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是世界共产党的中央，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组织，不抄不转不说不做是不可能的。当时共产国际的主张政策，以及改组中共中央和各级党组织，都不是贯彻执行实现了吗？不能把共产国际联共的主张强加在王明的头上，说成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当然王明在思想认识上是受到共产国际联共“左”倾深刻的影响，行动上也积极贯彻，但发明创造权不属于他，根子和主要责任不在他身上。

二、共产国际联共中央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一些正确的论述，在《两条路线》一书中也有大量的反映，如：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中国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是反帝反封建反蒋反军阀的革命。反帝是首要的第一位的任务。土地革命要坚决的大力的进行，共产国际联共斯大林不厌其烦的反复的讲要坚决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民政权和苏维埃政权，要建立农民武装，并一再指出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些理论，不仅有利于而且客观上也推动了根据地的出现，建立发展和巩固。后来共产国际也一再明确讲了要建立根据地和红军，共产国际联共斯大林一再强调后建立红军对革命的发展有严重的意义。同时共产国际针对苏区，反动统治区的不同情况的不同政策也作了说明。

共产国际、联共斯大林非常强调在民主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唯一领导者。共产党对苏维埃政权、红军、苏区、反动统治区各种政策及民众运动要加强领导，要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认为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不会有今天的苏维埃和红军，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胜利。

王明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但并不是说犯了“左”倾错误的人，在批评李立三维它（瞿秋白）“左”倾错误的每一句话都不正确。革命的敌人攻击我们，他们的动机不对，但他有的话，有的内容，还是要引起我们的警惕与注意的。王明的《两条路线》一书中，批评了李立三的一些“左”倾错误批评了维它的一些调和妥协，以及继续李立三的一些“左”倾认识还是对的。批评罗章龙搞分裂也是对的，对罗章龙的处理，也是六届四中全会选出来的中央处理了的。王明认为，中国共产党从第六次大会以来的两年中，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很大的成绩，这个认识也是正确的。当然这些正确的东西，也是来自共产国际，王明在《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中阐述了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大量的正确意见，不能因为他有“左”倾错误的一面，而就否定了他正确的一面。历史和事实是否定不了的。王明《两条路线》小册子既有“左”倾机会主义的一面，又有马克思主义正确的一面。笼而统之只说他是“左”倾机会主义政治纲领是不对的。应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正确的应当更正过来。

王明这个人狂妄，很不谦虚，语言绝对，一派教训人的架势。他说整个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及全世界先进工人群众，用一致的热烈的承认和拥护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直接继承者和发挥者。斯大林同志是整个共产国际及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领袖。我们认为我们是斯大林的学生，这是很光荣的事，因为只有斯大林的学生，才是唯一的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王明这样忘乎所以，狂妄的吹嘘自己，思想不大纯正。

1997年4月11日

共产国际策划操纵下的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一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策划和操纵把持下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极力贯彻他的“左”倾理论，认为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为了贯彻国际路线，必须大力反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首先是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共产国际按照预定的拥护国际路线的人员，通过会议的形式，组成了中共中央领导班子。同时，四中全会通过了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写成的决议。四中全会的结果，完满地达到了共产国际预期的目的，使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时间长达四年之久，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造成了空前严重的损失，其教训是深刻的。

二

共产国际是世界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党中央，他率领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由于革命历史发展的程度，和在斗争中缺乏经验，因之在工作上也有些错误，但是他的总方向，是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的，出发点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用心还是好的：因而在四中全会上有一些也是正确的。不是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的

“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对四中全会要作具体分析，他的主要方面是错误的，但不能全盘否定。

四中全会决议中，批评了李立三“左”倾路线所造成的恶果的看法还是对的。指出党同群众的关系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群众团体被取消，群众的发动被削弱，职工运动倒退了。广大干部受到了摧残，党的组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在苏区，红军的巩固和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造成了没有巩固的后方。提倡集体农庄，企图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禁止贸易自由和土地买卖，使苏维埃的经济更加困难。与中农的联盟受到了损害，影响了农民参加苏维埃运动的积极性。尤其是完全忽视建立巩固的苏区根据地和建立强有力的苏维埃政权机构。主张取消游击战争，使根据地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这是红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非苏区的农民运动被忽视，非苏区的苏维埃运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决议还批评了李立三否认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理论的错误。

决议继续指出了共产国际过去多次指示的中国的革命性质是民主革命，总任务就是动员组织革命势力向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国民党反革命进攻。当前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是动员各方面的力量，继续向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国民党进攻，党必须发展和巩固自己对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领导，要恢复已经损坏的党的组织，巩固和加强支部的活动。

三

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中央领导班子的安排。

四中全会的决议不长，但强调对共产国际的态度的文字却很多。决议说，共产国际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国际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必须绝对服从。决议反映出共产国际气势汹汹，对中共中央，对李立三十

分不满，共产国际与李立三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决议认为，李立三是反共产国际的，是敌视共产国际的，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是调和主义，三中全会的路线，是同共产国际对立的路线，六月十一日决议，正起了反共产国际政治纲领的作用。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立场，以及对国际代表的不尊重，负主要责任的是秋白同志，等等。

决议说，立三主义是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实际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亦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只有与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才能站在国际路线上，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必须完全消灭一切反共产国际的方针，才能克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

决议声称：为着执行这个任务起见，扩大的四中全会认为，必须取消三中全会所补选的赞成立三同志的中央委员，引进在反立三主义的斗争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并且要重新审定政治局的成份，以保证党的正确领导。

共产国际认为问题是严重的，必须极力加以解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详述了共产国际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和解决过程的情况。1930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讨论李立三路线问题。这次会议把李立三“左”倾路线，说成实质上是右的错误。同时把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说得一无是处。几乎所有与会者都赞扬王明等教条主义小宗派的人，说他们是懂得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是为国际路线而奋斗的，并为他们没有能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鸣不平。12月中旬，米夫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到达中国，他否定了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要求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便通过这次会议支持以王明为首的小宗派改变中共中央的领导，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取消原来对王明等人的处分的决议。12月23日至25日，党中央又接连任命王明为代理江南省委副书记、书记。

1931年1月7日，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2人，列席会议的代表15人，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参加了会议。会上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米夫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作结论。会上不断出现激烈的争议，米夫多次使用不正常的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王明在会上极力宣扬他会前写出来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的观点，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和瞿秋白，声称要全面彻底改造党。会议通过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最后，按照米夫以远东局名义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事先议定的名单，补选了中央委员和改造了中央政治局，李维汉、贺昌退出中央委员会，增补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为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中央政治局。新选刘少奇、王明、王克全、任弼时、陈郁等五人为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常委会主席仍由向忠发担任，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和四中全会的决议，米夫又在中国驻留半年左右时间，一切大政方针主要由他决定（《中国共产党历史》294—295页）。

决议说，扩大的四中全会，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纠正了党的政治路线，解决了党内的问题和革新了党的领导，保证了这一路线的执行。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1931年1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他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从上述四中全会召开的前后过程说明了事实并非如此。共产国际一切大事没有苏共中央同意是不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怎么能屈服于王明等人的压迫呢？！米夫也操纵不了他们，也不能把米夫个人的能量和米夫与王明之间的关系的作用说得神乎其神。其实，这是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的集体整个的思潮，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到王明、米夫以